

北方游牧民族鞍馬飾具的產生和發展

／安麗

自北方古代游牧民族馴服了馬，便世世代代與馬結下了不解之緣。爲了使馬更適於人所騎乘、控馭，他們製造發明了具有實用和藝術裝飾價值的鞍馬飾具，使人和馬的結合達到控制自如、渾然一體，爲北方游牧民族的馬術技能達到爐火純青、登峰造極的程度創造了必備條件，充分體現了北方游牧民族的聰明才智和獨具匠心的創造力，成爲北方草原鞍馬文化中最具代表性的內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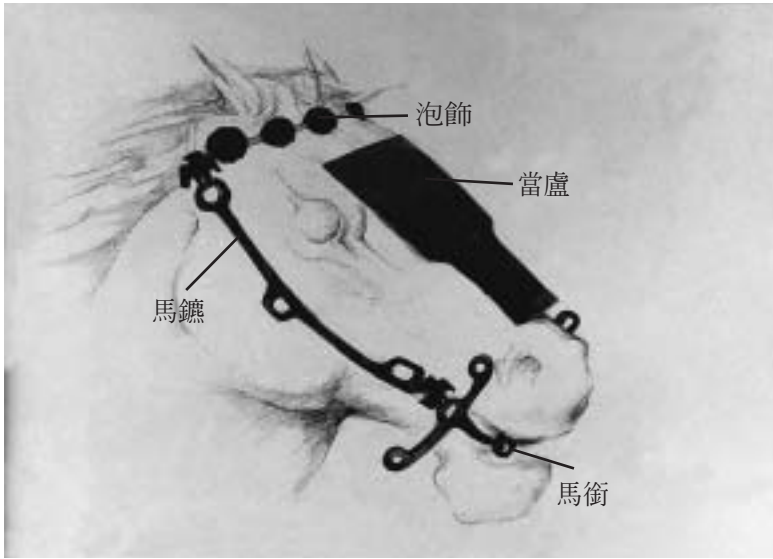
一

古人馴馬，最初採用的工具是用鬃毛、皮條編結的網狀絡頭（即籠頭），主要從馬的頭部控制和駕馭馬匹，絡頭起初沒有馬銜、馬鑣。爲了制服暴烈的野馬，在金屬馬銜產生之前，馴馬者可能是用一根結實的皮條向後勒住馬的嘴部，以便掌握方向和控制其跳躍奔騰。西周至春秋戰國時，北方東部草原出現了完備的青銅馬面飾，早期以赤峰市寧城縣小黑石溝出土的一套東胡民族的青銅馬面飾最爲精緻，其中包括防箭擊和裝飾作用的人面形當盧，其

固定於馬額及鼻梁中部，上寬下窄，高二一公分；還有固定於馬面兩側以控制馬頭的長三九公分馬嚼；橫貫於馬嘴通長八·八公分的馬銜（亦稱馬嚼），以及馬籠頭上的節約、泡飾等，說明此時北方草原東胡人所用的馬面飾已經完備並富有裝飾性，爲後來鞍馬飾具的發展開創了先河。春秋戰國時期，西部草原也大量出現了匈奴民族使用的馬面飾，亦具有控馭和防護



春秋戰國時期 北方古代東胡族的馬面飾



北方古代東胡民族馬面飾示意圖

作用的雙重功能，並有一定的裝飾性。如內蒙古伊盟杭錦旗桃紅巴拉匈奴墓出土的青銅馬面飾，其中有固定於馬額部直徑七公分的圓牌形馬面飾；有固定於馬面兩鬢側的圓形馬面飾，其下部連接可活動的三角形垂飾，全長一五·五公分；銅馬銜出土時仍橫置於馬口中，其通長二二·二公分，由兩節組合而成，中部兩環相套，兩端各連接一環圈，以放馬鑣。以上這些馬面飾出土時連帶的皮條和繮繩早已腐爛，



匈奴民族馬面飾示意圖

祇有附在上面的青銅飾件保存完好。
馬具中鞍、鐙、盤胸、韉帶的產生比馬銜等面飾具要晚得多，早期乘騎馬均無鞍橋凸起的馬鞍，祇在馬背上鋪一塊軟皮或毛氈類座墊，類似馬韉，以防止摩擦並保護馬背。從陝西咸陽楊家灣出土的前漢時期的騎馬武士陶俑可以看到這種形制，有在馬背上加彩塗繪一弧形座墊，也有在馬背上以紅彩繪一圓圈狀示意為座墊，秦兵馬俑二號坑出土的馬俑身上也飾



甘肅武威雷台漢墓出土的銅騎馬俑

有這種座墊的式樣，均無馬鞍和鐙。由於馬的背部較平坦，騎者遇上下坡地或馬俯首、昂脖時難以坐穩，古人便想到抬高前後鞍體以作擋護，也可推測古人由前後均有擋護的駝峰得到啓發，從而發明了前後略起鞍橋的馬鞍。從漢北曾出土過平緩的鞍座和穿馬鐙推測，匈奴人可能是最早使用馬鞍和馬鐙的民族之一。西漢末期，這種鞍體低矮、略起鞍橋的馬鞍逐漸推廣開來。至東漢時期，前後鞍橋凸起已較爲明顯，在甘肅武威雷臺東漢墓葬中出土的銅車馬儀仗俑中，有馬背上搭有長方形座墊式馬轡的銅馬，也有騎於馬鞍上、手持兵器的騎士，其馬鞍兩端鞍橋已明顯隆起，前後鞍體兩側各豎向鉚二鐵穿環，其爲固定馬鞍或攜物繫掛之用。騎者雙腿自然下垂，沒有腳鐙。

二

爲了乘馬之便，人們又發明了馬鐙，最初祇有上馬之左側的單鐙，其固定於鞍板上，後來發展爲兩側的雙鐙，這樣在騎乘過程中也更穩定。馬鐙的材質最初祇是簡易的皮圈，後來逐漸爲金屬馬鐙所代替。在內蒙古烏拉特中旗烏拉山脈發現的岩畫中，有繪刻早期馬鐙的畫面，其造型似金屬馬鐙，爲匈奴族或其他游牧民族的作品。一九七九年在青海省土族自治縣一座東漢墓中，曾出土過一件馬紋青銅飾牌，在其馬腹部有一寬大的方形馬鐙，這種飾牌在青海省海南地區也有發現，是典型的匈奴文化遺物。從其馬鐙形制來看，也似金屬馬鐙。至今發現的早期馬鐙實物是一九九三年在吉林省長春市郊出土的一副銅皮包裹木芯，並以鉚釘對合加固的馬鐙，其形制爲皮圈式上窄下寬的吊環形。上端延伸出長方扁柱形有穿孔的提柄。此墓葬的年代上限爲西漢中晚期，下限爲南北朝時期。至東晉鮮卑族強盛時，其墓葬中多出現有吊環式金屬馬鐙。如遼寧省朝陽十二臺營子（和內蒙古接壤）鮮卑墓出土的吊環式鐵馬鐙，爲至今發現時代最早的鐵馬鐙。這一地區還出土有銅鑲金吊環式馬鐙，其中間包裹的木芯多已槽損，扁圓形鐙環的內徑爲一二公分，厚二·五公分，腳鐙處微凸，上部爲長方形提柄，長一七公分，寬四公分，柄之上端有一扁長方形穿孔。鐙柄及鐙環均分布有鉚釘孔。這種馬鐙在遼寧北票、吉林集安、萬寶汀

M十八都有出土。均屬東晉慕容鮮卑三燕文化的遺物，距今約一七〇〇年。金屬馬鐙的發明使用，在游牧文明發展史上具有重大革新意義，標誌著鞍馬文化的一大進步，其不僅上下馬方便自如，在躍馬飛奔時身體也容易保持平衡和穩定。在馬背上可坐可站，還可靠馬鐙的支撐把雙手解放出來，更自如的使用兵器，促進了騎馬術的提高和發展。金屬馬鐙發明後，很快傳到朝鮮、日本，同時還向西方流傳，首先傳到土耳其、古羅馬帝國，最後傳播到歐洲大地。

三

鮮卑族在東漢末年時已是「兵利馬疾，過于匈奴」。（《後漢書·烏桓鮮卑列傳》），至魏晉十六國三燕時期，從東部進入遼西地區的鮮卑族經過百年發展開始強盛，其鞍馬飾具在前人基礎上，又吸納了在此之前的烏桓，以及因中原戰亂而流入遼西地區漢民族的文化風格，有了迅猛的發展。從遼西朝陽地區出土的大量精美絕倫的成套鑲金馬飾具來看，其工藝的精湛，形制的美觀，馬具的完備與成熟是前所未有的。因此，學術界有「中國馬具是魏晉時期發展並完備起來」之說。還有學者認為這是「古老的鮮卑族對人類文明的一大貢獻」。

鮮卑馬飾具除面具完備的馬籠頭、馬鞍、馬韉、馬鐙外，還配置了套於馬頸部、固定馬鞍的攀胸、置於馬臀部的後韉帶，以防鞍座向

前和兩側傾斜，功能極為完備。這些馬面具、攀胸、韉帶上還綴有鑲鈴、布搖等裝飾，顯得極其富麗豪華，其不僅在形制上有了很大的改進，而且特別注重馬鞍具的質地和裝飾紋樣。同時還出現了作戰披掛的馬鎧甲。

從一九八八年遼西朝陽十二臺鄉出土的鮮卑族馬面飾看，較之過去有了很大的變化，如出土成套馬面飾中的銅鑲金當盧，形制為上寬下窄，整體呈上部有三束火苗狀的火炬形，頂部正中立一扁柱，上面支一半圓小銅座，座底有二穿孔，以固定馬纓之用，當盧周邊左右對



北魏 牽馬陶俑



內蒙古遼西朝陽出土的馬鞍前橋包飾（北魏）

稱，穿附二十八個套管穿連的布搖葉，另有四個穿孔為穿繫固定馬頭之用。這種形制的當盧在同時期的其它鮮卑墓葬中，如朝陽縣七道嶺鄉三合成村也有發現。同時出土的銅鑲金馬鑲（一副二件），外輪廓是四連弧形，為橢圓形板狀銜鑣，其上部連弧較平直，有一橫穿，用於和轡頭相連，中部有一豎穿，穿中間鉚一橫梁，以固定馬銜與連接纏繩的引手，馬銜為鐵質，已銹蝕無存。

朝陽十二臺鄉出土的素面和鑲雕銅鑲金馬鞍飾具中，最為精緻的是木芯銅鑲金鑲雕龍鳳紋鞍橋包飾，前橋拱形包片高二八·七公分，上寬四五公分，下寬三一·八公分；後橋拱形包片高三二·五公分，上寬五九公分，下寬五

四公分，邊緣另鑲槽深〇·八公分的包邊，前後鞍橋以鑿刻的契點紋連成所繪圖案的線條，然後將圖案輪廓線以外鏤空，上面鑲金，其圖案紋樣是大小不等的多方連續龜背紋地，內飾龍鳳、怪獸、鹿、人首鳳身（羽人）等，另外還出土二副（四件）銅鑲金鑲雕鳳紋翼形片鞍翅，起穩固鞍橋、鞍板、連接韉帶的作用。此種鞍飾一九七三年遼寧北票縣章吉營子西溝村古墓也有發現。一九九五年在遼西朝陽縣七道嶺鄉古墓出土的前燕時期馬飾具中，有鞍橋形狀同前的銅鑲金鑲雕狩獵紋鞍橋包飾，圖案為大小不等的多方連續龜背紋為間框，框內刻騎士射獵紋、龍鳳紋、鹿紋。其不僅具有濃鬱的草原游牧文化特色，還吸納了中原文化的特色。從出土的這批馬鞍具可看出，鮮卑族於魏晉三燕時期鞍橋已明顯加高，屬高鞍橋馬鞍。以上這些馬飾具精美考究，超過以往任何時候。

四

繼鮮卑之後，又一支游牧民族突厥族於隋唐興起，活躍於北方廣大草原，其勢力不斷強盛。轄地東起遼河上游，西至中亞海，北到貝加爾湖，南接長城邊緣（統治中心的汗庭設在今鄂爾渾河上游杭愛山附近），成為隋唐時我國北方最強大的民族政權。突厥族十分重视養馬業，不斷以良馬貢與大唐王朝，《唐會要》載：「突厥馬技藝絕倫，筋骨合度，其能致



赤峰市敖漢旗遼代古墓殘棺木板上發現的「鷹軍圖」

遠，田獵之用無比」。突厥族不僅養馬業繁榮，他們製作的突厥鞍也非常著名，馬籠頭、盤胸、鞍、鐙、後轡均齊備且精良，對唐代鞍馬具的製作產生很大影響。

屬東胡族系的游牧民族契丹，約在公元四世紀中活動於內蒙古東部西拉木倫河和老哈河



111 遼代壁畫〈射獵圖〉

流域，後不斷繁衍興盛，於公元十世紀稱雄北部草原，公元九一六年建國立號，初稱「契丹」，後改「大遼」，定都上京（今內蒙古赤峰巴林左旗），創造了舉世矚目的遼文化，鞍馬歷史也進入了燦爛的時代。遼代馬鞍在前人基礎上有了進一步發展，尤其是皇家貴族鞍馬節

具的製作更加精美、華麗，馬籠頭、攀胸、鞍座、後鞅飾等除實用功能外，更講究藝術裝飾性。遼鞍整體加寬、加高，前鞍橋高於後鞍橋，騎乘舒適平穩。由於國力強盛，經濟繁榮，契丹貴族所乘之鞍均用金、銀、瑪瑙、玉石等貴重材料製作包裹，其上鑿刻龍、鳳、鹿

紋和纏枝花卉紋等精美紋飾，馬鐙製作也常出現鑲金工藝。此「契丹鞍」名傳中華各地，與當時的蜀錦、端硯、定瓷並稱天下第一。如一九五四年內蒙赤峰大營子遼駙馬贈衛國王墓出土的大量馬具隨葬品，其質地有銀、銀鑲金、銅鑲金和瑪瑙多種，均為成組成套出土，在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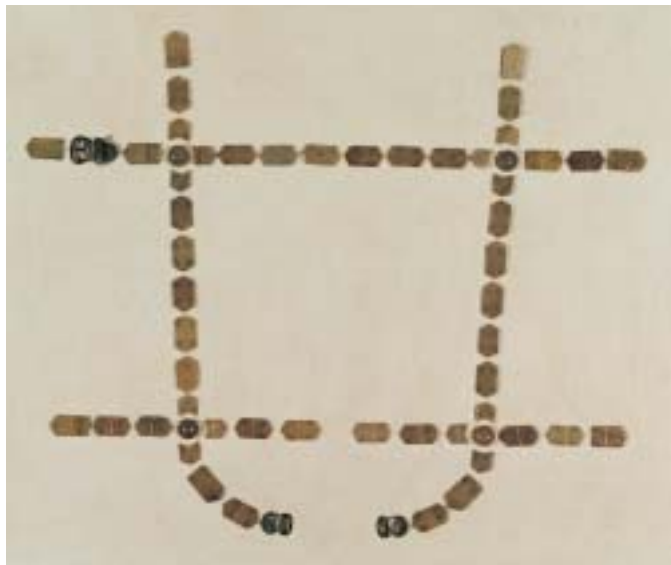


遼駙馬墓出土的馬鈴，聲音極其悅耳



遼駙馬墓出土的遼代馬飾具

屬馬具上，大都飾有繁縟精美的龍、鳳等動物紋和花草紋圖案。無論是馬具的種類和數量，還是馬具裝飾的華麗精製，都是考古發掘中少見的。其中出土的浮雕鹿草紋銀鑲金馬飾具有六十五件，銅鑲金浮雕龍紋馬飾具有一六四件，瑪瑙馬飾具一〇一件。這些成套馬飾具包括馬籠頭飾件、馬繯罩、攀胸飾件、鞍座飾件、後座鞵飾件、馬鐙等。此墓出土的馬身披掛大小鑲金銅鈴，音色各異，有的清脆響亮，有的渾厚低沉，組合在一起，便是一種奇妙悅耳的和聲音響。這些經清理後的馬飾具，整體



遼駙馬墓出土的瑪瑙馬飾具

金光璀璨，其工藝達到極高的水平。

五

約在公元七世紀左右，蒙古族出現於唐代史籍中，稱「蒙兀室韋」亦屬東胡族系，游牧於鄂爾古納河流域，是當時衆多室韋部落中的一支，後逐漸成長壯大，到公元十二世紀形成較大的部落集團，十二世紀末，蒙古乞顏部傑出的領袖鐵木真統一了蒙古諸部，於公元一二〇六年建立蒙古汗國，稱成吉思汗，形成新的蒙古民族共同體。成吉思汗及其子孫，帶領蒙古鐵騎，進行長達五十餘年的征服戰爭，相繼滅西夏、金王朝、遠征中亞東歐，建立附屬四大汗國，形成橫跨歐亞的蒙古帝國。

公元一二六〇年，成吉思汗之孫忽必烈登大汗之位，改國號為大元，開始進行統一全國的戰爭。公元一二七六年滅南宋，實現中國空前規模的大統一。此時元的疆域南抵南海，北至貝加爾湖，東到澎湖，西越中亞，定國都於大都（今北京市），以上都為陪都（今內蒙古錫盟正藍旗），成為當時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

成吉思汗及其子孫之所以能所向披靡，席卷歐亞，並為歐洲人嘆服，主要依賴於發達的畜牧業經濟和蒙古鐵騎的兵馬之利。蒙元時期，養馬業空前發達，馬鞍飾具的製作也更為考究。從內蒙古地區出土的蒙元鞍馬飾具看，其工藝和製作普遍講究簡捷美觀，更便於騎乘，馬鞍種類有鞍體較窄，前橋高，後橋較低

的征戰狩獵馬鞍；有鞍體較寬，前後鞍橋較平緩的生活馬鞍等。紋飾以龍鳳、臥鹿紋、牡丹紋、雲紋、捲草紋為主。如內蒙古鑲黃旗出土有一套浮雕臥鹿牡丹花紋金馬鞍具，其鞍體較窄，前鞍橋高二〇·八公分，寬二三公分，後鞍橋高一公分，寬一六公分，此為迄今發現



臥鹿牡丹紋金馬鞍具（蒙元時期）

最精美的一套蒙元時期的鞍馬具，根據其隨葬物判斷，此為一蒙古貴族女子生前所用。元朝時國家在上都還設有官辦的「鞍子局」，有工匠數千人之多，為專門行業的生產部門，這是前代北方游牧民族所不會有的，由此可以想像，蒙古騎兵裝備的正規化也是前所未有的。



元 備鞍陶馬

從這點也可看出，蒙古族將北方草原鞍馬文明推向了頂峰。

至明清以來，蒙古族馬鞍的種類和質地更為豐富，有用於狩獵、牧馬的輕便小尾式馬鞍，也有用於日常生活的大尾式馬鞍，其鞍座包飾除金、銀、銅、各種獸皮、鯊魚皮外還增加了景泰藍裝飾，並以鑲金銀飾或銀飾條鑲



清代蒙古草原套馬打印圖

邊。另外鏤雕和鑲嵌工藝也很普遍。馬鐙的質地有銅、鐵、銀、景泰藍等，在清代比較珍貴的馬鐙要屬透雕的九斤重九孔透龍鐙，嵌在二龍之間的寶珠，隨著馬的行進發出悅耳的聲響。

草原上有「好馬必備好鞍」之說，從馬鞍上往往能看出主人的身份和馬的等次。為了裝



清 雙龍首銅馬鐙



阿拉善達理札雅王爺馬鞍



內蒙古阿拉善王爺達理札雅的鑲銀馬鞍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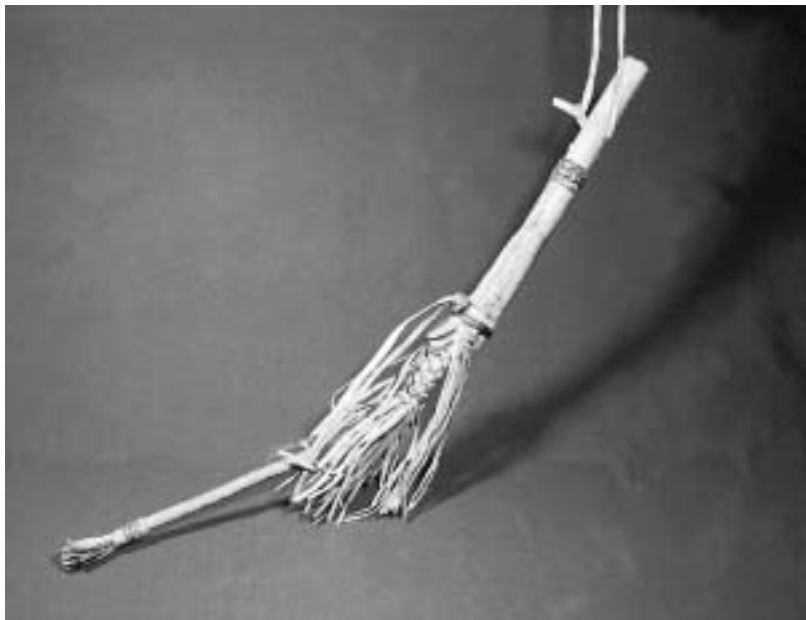


內蒙古阿拉善盟達理札雅蒙古王爺的鑲珙瑯彩鑲金銀飾馬鞍
(前橋部位特寫)



「達」記鑲金包皮銀馬鞍(阿拉善達理札雅王爺生前所用)

飾心愛的駿馬，在馬鞍具的製作上，蒙古人不惜重金，將其裝飾得流光溢彩、富麗堂皇，並以此為自豪。如內蒙古博物館藏的阿拉善王爺達理札雅使用過的鑲景泰藍、鑲金銀飾馬鞍具；「達」記「包皮鑲銀馬鞍具」，均配以皇親國戚才能使用的紫韁。當今草原上流行的馬鞍有元寶式、八旗式、哈拉哈式、吉心式、烏蘭都式、布亞特式等各種風格的馬鞍，這些馬



圖一五 清 皮馬鞭

鞍乘坐時舒適平穩，不僅適於在平坦的草原上奔跑，也適於在不平坦的山坡窪地躍馬馳騁。綜觀上述，中國北方游牧民族鞍馬飾具的形成與發展已有三、四千年歷史，經歷了由樸拙簡易到繁複完備的發展過程，它與歷代馬背民族的發展興盛有著密切的關係，成為中國北方草原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從這些各時期遺留下來的大量精美鞍馬飾具可以看出，北方游牧民族在過去的歲月中，曾有過的叱咤風雲的輝煌歷史和深厚的文化內涵，將會永遠閃爍著璀璨的光芒。

參考書目：

- 郭素新、田廣金，〈鄂爾多斯青銅器〉。
遼寧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朝陽市博物館，〈朝陽十二台鄉磚廠八八M1發掘簡報〉《文物》一九九七年十一期。
田立坤、張克舉，〈前燕的甲騎具裝〉《文物》一九九七年十一期。
于俊玉，〈朝陽三合成出土的前燕文物〉《文物》一九九七年十一期。
田立坤、李智，〈朝陽發現的三燕文化遺物及相關問題〉《文物》一九九四年十一期。
孫國平、李智，〈遼寧北票倉糧窖鮮卑墓〉《文物》一九九四年十一期。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技術室，〈安陽晉墓馬具復原〉《考古》一九八三年八期。

